

晚清海归与小说



WANQING HAIGUI YU XIAOSHUO

黄 曼◎著

就晚清整个小说创作群体而言，海归仅为其中一隅，但他们以其特有的文化身份与小说经历牵动着中国小说过渡中的一切最关键因素和核心问题。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晚清海归与小说

黄曼◎著

WANQING HAIGUI YU XIAOSHUO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海归与小说/黄曼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8
ISBN 978-7-5622-8083-5

I. ①晚… II. ①黄…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8027 号

晚清海归与小说

© 黄 曼 著

责任编辑:鲁 丽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press.ccnu.edu.com>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字数:290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19年8月第1版

定价:55.00元

责任校对:王 炜

封面设计:胡 灿

电话:027-67863220/7792

邮编:430079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督印:王兴平

印张:18.25

印次: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7353

序

陈大康

初见黄曼的这部《晚清海归与小说》，有些读者可能会感到突兀。“海归”是近些年才出现的新词，它有特定的含义，是指海外留学后回国的人员，现在本书将“海归”一词与晚清时的小说发展相联系，确实有点出人意料之外，而迄今为止，将近代小说研究与“海归”挂钩的论著确也实在少见。正因为如此，作者在开篇伊始的“绪论”中就对她所使用的“海归”一词作了定义：“那些只要有过出洋经历的人，无论其所去何国所为何事，又无论其是否具备某种学历或其在外时间是长是短，都统称之为‘海归’。”作者活用“海归”一词有其道理，因为本书要揭示、解释与归纳的现象说到底，是欧美、日本等海外的小说观念、创作方法、传播形式与理念等对我国近代小说发展的影响。阅读书报与作品是将影响转化为现实的重要途径之一，而海外归来者从事小说创作翻译以及传播，或是作理论介绍与阐述，则是更重要的直接媒介，对于他们当然不能用是否为留学生作限定。在明确“海归”的定义后，作者又介绍了本书的写作宗旨：

本书以晚清海归以及他们在晚清时期（主要集中于1900年后十几年）的小说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晚清海归在小说写作、小说立意、小说传统批判与承继、小说市场开拓与竞争中的作为与特点，同时探寻他们与中国小说过渡的相互关联。

本书的定义与写作宗旨都明确了，但由于这个问题比较新鲜，以往鲜有人涉及，更未有系统的论述，于是读者很自然地会产生一个问题：“晚清海归与小说”这一论题的研究有何价值与意义？

倘若仔细梳理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间处处可见海归的身

影，他们推动近代小说发展的贡献重要且醒目。大家都知道第一部爱情翻译小说是《巴黎茶花女遗事》，由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不难想见该书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效应。译者林纾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翻译家，但他却不懂外文，全靠与王寿昌的合作，此书方能问世。王寿昌就是一位海归，他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留学法国，十二年后才回国，合作翻译这部小说就是出于他的提议。《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后不久，陈绎如、薛绍徽夫妇合译的《八十日环游记》出版，从此法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凡尔纳的作品也开始在中国风行，而陈绎如曾游学日、英、法等国，其兄陈季同历任中国驻法、德、意公使馆参赞，曾创办《求是报》连载《卓舒及马格利小说》，创作《孽海花》的曾朴曾受他很大影响。以独立翻译小说而著称的有伍光建，他留英归国后翻译的《侠隐记》、《续侠隐记》也脍炙人口。近代翻译小说共有1300余种，其中有相当大部分都出自海归之手。这些有海外经历的人的文学活动并不止于翻译，他们同时还创作了许多作品。陈天华的《狮子吼》、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虽然都首刊于日本，但都被国内报刊转载，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的作品对唤醒国民投身救亡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中有些人还是多产作家，陈景韩在翻译的同时就创作了45种小说。如果排列自创小说的作家，可以发现这是一个长长的序列，而蔡元培、陈独秀等著名人士都厕身于其中。

那些海外归来者的贡献并不止于翻译或创作了一些作品，他们的另一突出功绩，是对推动近代小说发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考察近代小说的发展时，必须提及梁启超倡导的那场“小说界革命”，它以磅礴的气势扫荡阻碍小说生存与发展的障碍，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偏见开始被扭转，这一文学体裁在文学殿堂里得到了它应有的地位。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小说界的状况因此一变，创作以新的面貌、新的内容出现渐成主流。在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之后，小说与政治这两条线索渐行渐近，终于出现了“小说界革命”这一交叉点。政治借小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拥有数十年能量积累并伺机改变自己态势与行进轨迹的小说，则借助于此交叉点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虽然梁启超赋予小说以政治使命，强调“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焉”曾产生过负面影响，但“小说界革命”毕竟使近代小说在短时间内展现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面貌，其历史功绩谁也不可小视。

与梁启超同时在日本的中国学者、留学生数量众多，且不管是革命派还是维新派，都认可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据宋教仁 1906 年 11 月 28 日的日记，孙中山甚至都打算与他合译小说。现所见在日学人所办的 38 种报刊上都载有小说，共 174 种，办刊者有梁启超、宋教仁、秋瑾等近代史上重要的活动家，而小说中则有陈天华、冯自由、周树人等人的作品。这些报刊同时也在国内发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在他们中间还产生了《累卵东洋》、《女子救国美谈》等小说单行本，以图达到“开民之脑机，导之以文明之前路”的目的。在日学人中，郑贯公是以往近代小说研究甚少提及但确应重视的人物。他早年追随梁启超，后因倾向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遭驱离。郑贯公在日期间就创办《开智录》刊载爱国小说，归国后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与《唯一趣报有所谓》，也都通过小说向大众宣传爱国思想。郑贯公去世后，受他影响的《东方报》与《少年报》等继续刊载小说，其中重要作家如王斧军也是海外归来者。此后，由南洋归来的黄伯耀、黄小配与邱炜萋等人也参与了小说的创作翻译或小说理论的阐发，他们连续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并创办了小说专刊《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与《新小说丛》，这些人持续的努力，终于使粤港地区成为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镇之一。

同时应该提及的还有陈景韩，他在近代翻译与创作的小说就有 109 种（其中 6 种与人合作），还主持或参与主持了小说专刊《新新小说》、《月月小说》与《小说时报》的编辑。他任《时报》主笔期间，率先创作并刊载了短篇小说《马贼》，并在篇末解释说，“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同时又向社会征稿：“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马贼》刊载后，短篇小说在《时报》上不断刊出，随后又普及到各个报刊。这篇小说的刊载与《时报》的征稿在今日看来实是很寻常的文学事件，但它在近代小说史上却有两方面的非同小可的意义。首先是短篇小说创作的提倡。在中国小说史上，供案头阅读的通俗短篇小说滥觞于明末模拟话本的创作，它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在明末清初时出现了创作高潮，随着由改编转入独创，模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也逐渐淡化，已形成纯粹

的短篇小说。可是自康熙后期开始，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已较稀少，乾隆朝后，短篇小说更是消失了百余年。短篇小说创作沉寂的原因此处不赘述，这里要强调的是陈景韩的倡导，引起了短篇小说创作的复兴。至于支付稿酬，首开先例者是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其创刊号宣布自著作品千字酬金分四等，从四元至一元五角不等；译稿分三等，从二元五角至一元二角不等。可是其后问世的《绣像小说》、《新新小说》等报刊都未言及稿酬。稿酬观念普及需要有个过程，当年《申报》征稿时宣布“概不取值”，在人们的心目中，不收版面费已是很大的优惠，也难怪《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时，林纾听说有稿费便大为惶恐，赶紧捐出，以免有碍清誉。所以《时报》宣布录用的短篇小说“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此后该报对刊载的小说支付稿酬渐成常态。当时是否刊载小说会明显地影响报刊的销路，竞争的形势迫使各报刊先后允诺支付稿酬，这一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在这一过程中，《时报》的表率便有了引导作用。稿酬制度的确立，催生了一批以撰写或翻译小说为生的专业作家，他们成了近代小说发展的中坚力量。

提高小说地位、提倡短篇小说以及稿酬制度的确立，都是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而究其思想来源，都是对欧美或日本较先进的观念的借鉴，而这类事例，其实也不止于上述三者。在借鉴外国较先进的观念或做法方面，有海外经历者显然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将这些引入国内后经历磨合、折冲最终形成适合国情的结果，这些工作大多也由他们完成。其功绩大矣，其作用显矣！由此可见，将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进行考察，梳理他们对近代小说发展的贡献，归纳其间的特点与规律，是一个学术价值相当高的课题。多年来，有一些对这类人的个案研究，如对梁启超的研究就非常多，但对其他人则研究者甚寡，多数尚属无人问津的状态，至于将有海外经历者归为一个群体作考察，据笔者陋见，黄曼的书稿《晚清海归与小说》似尚属第一部。

黄曼的书稿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她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经常与我围绕海归与中国近代小说发展关系问题交换意见，我对她的研究思路、写作方式以及所付出的辛劳都比较清楚。由于这一论题前人未有系统研究，资料搜集、梳理与辨析等基础工作就相当繁重。与中国近代小说有关系者两千余人，作者、译者与办刊者等也有千余人，何人

属于海归的甄别就不是轻松的活儿，因为像梁启超这样可直接判定的人物毕竟只是少数。这些人的海外经历也须尽可能地厘清，因为经历会影响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或改变；这些人是归自欧美或日本或南洋须作清楚的厘分，在不同国家所受的教育或观感都会带上当地的烙印，从而导致他们的小说观念、创作方法、传播手段互不相同，他们与小说有关的活动及其意义也会产生差异。黄曼很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这些人的小说活动应具体考察“在怎样的历史处境与个人处境中出场并展开”，而不可作“无关痛痒或者大而化之的背景式陈述”，因为这些将“极其深刻并且细致入微地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尽管有许多人已无从查询其生平，其中有不少人在近代小说史上只留下一个笔名，更无查找线索，但黄曼经过艰苦搜寻与辨析，她已掌握的海归已构成一庞大的群体，以此为基础，可进行科学的、有条理的分析评判，并探寻其中的特点与规律。

黄曼的《晚清海归与小说》是其才华与艰辛相结合的成果，黄曼究竟写得如何，这自有她的著作可供大家评析，已无须我多说些什么。我相信，此书显示的研究思路、论证内容以及所引用的丰富资料，都有助于对近代小说的进一步研究，同时我也期望黄曼以此课题的完成为基础，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

目 录

绪论	1
一、历史处境：危机与过渡中的晚清	1
二、个人处境：海归生平及其相关履历	10
三、研究现状	35
第一章 小说写作	42
一、写作的实力	42
二、写作与交游	78
第二章 小说立意	94
一、国家、国民	94
二、其他立意	132
第三章 传统承续	151
一、选择：文人旨趣与大众旨归	151
二、旧小说批判	162
三、艺术分析、批评传统及其他	181
第四章 市场开拓	193
一、办报和刊载小说	194
二、办书局和印行小说	215
三、海归著译小说在市场中	223
结语：晚清海归与中国小说过渡中的进展与曲折	246
参考文献	254
附录 1 海归创作小说相关情况统计表	261
附录 2 海归翻译小说相关情况统计表	269
附录 3 海归评点小说相关情况统计表	276
后记	281

绪 论

本书以晚清海归以及他们在晚清时期（主要集中于1900年后十几年）的小说活动为研究对象，重点揭橥晚清海归在小说写作、小说立意、小说传统批判与承继、小说市场开拓与竞争中的作为与特点，同时探寻他们与中国小说过渡的相互关联。“海归”这个词在今天有它较为特定的意涵，主要指那些在海外获得某种学历而回国的知识人。但鉴于晚清当时的现实，我们这里所说的晚清“海归”其意还要宽泛些。我们把那些只要有过出洋经历的人，无论其所去何国所为何事，又无论其是否具备某种学历或其在外时间是长是短，都统称之为“海归”。作为全部研究的起点，我们首先需要把握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晚清此一时代的意涵与特质；第二，海归群体的生平与境遇。概而言之，即考察我们笔下这一群海归以及他们的小说活动是在怎样的历史处境与个人处境中出场并展开。显然这绝不等同于那种无关痛痒或者大而化之的背景式陈述，我们将发现这两个问题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极其深刻并且细致入微地影响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因而理所当然成为此书的完全论述基调。

一、历史处境：危机与过渡中的晚清

本书所说的“晚清”主要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1年清帝逊位的十几年时间。这十几年里中国的时局、社会、人心都发生了真正的所谓“剧变”。新旧消长、中西互通，顾后瞻前、相抵共存。这是一个乱象横生、密度极大而又意义非凡的时间段，可以肯定地说它的容量罕有其匹。当时人以及后世史家的论述浩如烟海，归其缘由实在于晚清确为一个一言说不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我们提炼出与本书最相近的两个关键词予以强调：“危机”和“过渡”——前者为晚清最迫切之现实，后者为晚清最深刻之现实。

晚清所面临的危机不言而喻，这种危机起码在两个层面上都达到空前的程度。一个层面当然指的是存亡的危机。中国的失败并非开始于清代，几千年传统流变累积下来的沉痾痼疾不是仅用清廷的腐败或者锁国就可以简单交代的，但这一失败的局面却在晚清时期总爆发并被总发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的主权沦丧愈演愈烈，至甲午北洋舰队海上失利，中国败于弹丸小国日本；戊戌百日维新，中国再败于自己几千年封建与内斗的弊习，这意味着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唯存笨重躯壳，清廷既乏应对现代战争尤其海上战争的实力，更无自新自强之能力与魄力。屡次战争是国与国的较量，更是落后的与先进的两种不同文明的必然角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西方的强势、中国的衰弱莫不如此。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可以说几乎所有人、所有群体其实都无计可施，所谓“智勇俱困之秋”，一切的难题都在此聚集了。存亡危机遂成为晚清最迫切之现实与困境。它最直接影响了这一代以至此后若干代人的命运轨迹。时代的风貌也基本由它决定，我们看到救亡主题始终是压倒性的主题。而往更深处看，存亡危机在晚清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充当了一种非常重要但又异常矛盾复杂的角色。它极大地推动着同时又干扰着中国的现代性步伐。换句话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那些所谓“迥异于西方”和所谓“包含着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其实多多少少都与存亡的要务相关。比如，为什么恰恰是在中国民族主义展示了它极其狭隘的一面；为什么是在中国国家与集体成为严重桎梏个体人性的枷锁；为什么是在中国启蒙成为格外艰难的任务；又为什么恰恰是在中国对审美之现代性的觉悟和捕捉要远远迟钝于现代性之其他表现。类似情况不一而足。

晚清危机的另一个层面则是意识领域的秩序危机。晚清，如果说政治意义上的家国遭遇是惨烈的，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精神的命运也许显得更为曲折艰深。事实上，西方帝国的海外殖民不起于中国也不止于中国，但在众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中，像中国这样感受了文化相遇的持续剧痛的却并不多见。几千年中国稳居于自己建构的牢固意义框架中，自成路轨，自适自足，它成就了整个东方文明中的主导地位，也使得中国一度领先于世界。但19世纪后半叶西方强势异质文明随坚船利炮

呼啸而来，打破了原有之秩序。在中国文化的旁边第一次站出了真正足以撼动其全部自信与合法性的他者。这一刻，可以想见，中国人从自己既深且久的经典沉醉中抬起头来，他们眼中现出的是何样的惊异和错愕。过去已去，未来未来。处于古今中西交汇处的晚清人要怎样与他们身后的传统与身前的世界相处？这是一件艰难的事，也实在超出大多数人的智力与情感选择的限度。所以无所适从、众声喧哗、含混流连，又或者轻率操切便成为一时风貌。有有意的坚守和无意的徘徊——这一辈人固然也对历史传统抱着切肤的“残废感”，可是他们显然无法也无力将过去的一切从自身剥离，即使异质文化兴冲冲满携促因而来，他们也无法脱胎换骨，谁又能真正彻底地投入反对自身的战斗而毫不迟疑？所以墨子刻会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不仅是在外强欺凌下救亡图存的历史，也是过去久远年代里绵延不绝的寻求道德根基的文化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①又有躁进而唯利的选择——一些人决意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里面做不拘一格的担当者，可是现实需要与个人境遇会在事实上使他们偏向激进和功利的一方，并且往往驱赶他们落入对某些政治信仰的执迷中去，因为政治信仰恰在此时不失时机地“提供了逃避意义和秩序危机的庇护所”^②。所以最终在意义的诉求上这个时代基本是无序和失范的。它混杂多元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全部人最微妙而敏感的文化与精神危机。而面对它还较少有人表现出超越历史界限的深度来。这样一种状态不只在晚清，即使在后来的整个世纪中都是一样的。

晚清更深刻之现实则为它的过渡的特性。所谓“过渡”指中国的社会到了晚清时已相当明显地表现出它从一个传统形态社会向现代形态社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实质即为现代性。近代以来，自西方而东方，现代性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有着非常丰富和复杂的内涵。现代性往往与现代化密不可分，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工业化、城市

^① [美]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封面。

^② [美]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

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①，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显然在晚清中国这些方面或指标都初现端倪了，此为学界共识。不过，关于中国之具体现代性始终存在诸多疑点与争议，比如它的时间断限问题、它的发生动力问题、它与西化的区别和关联等。所以这里我们仍然选择采用“过渡”这样一个词来更为稳妥地予以描述，而这个词也是晚清当时人自己所最普遍直觉到的时代特质。

从政治角度考虑，晚清的过渡性有两点最值得标明。一是此时期中国人对自己的组织方式以及自己之外世界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变化。传统中国人所持的天下观念、以中国为中心的万国观念、华夷观念开始全面崩溃。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华夏中心主义正式解体：“甲午战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朝野士大夫对儒家伦理优越性和儒家提供的社会组织蓝图产生了怀疑，中国也不再处于用道德教化世界的至高无上地位。也就是说，华夏中心主义从此解体。”而这其中最能反映中日甲午战争后去中心化的万国观具有很强世界主义性质的现象就是留学热潮^②。二是现代国家概念被引入，并且随着民族主义热潮的兴起，民族利益与国家命运成为自此后中国人政治生活最不得不去坚守的价值观核心。这一核心注定了国家叙事必然在未来诸种领域都占据无可替代的主体位置。我们将看到对国家的执着，或者毋宁称之为一种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弥漫于晚清整个社会，并且很快成长为一不证自明的信仰公理。而不论行其实者或是假其名者，又或者对其持怀疑态度者都无法不以此为起点和中心延展开去。

思想史这时也迎来了它的转折。19世纪下半叶或者更早些时候，今文经学在儒学内部开始复兴。经世致用成为有为士绅阶层的普遍诉求。以魏源、龚自珍等为代表，他们严肃批判中国古文经学和清中叶考据之风，

^① 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见《现代性研究译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页。

^② 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重申社会取向在儒学中的首要地位。粤学领袖、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就特别强调学术的道德实践性，他的教育理想是“把学术研究运用到儒家的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①。康有为质疑古文经学之真伪，他以今文经学为汉学正宗，所以撰写了那本搅动世议的《新学伪经考》。至梁启超诸人已经是处于这一今文经学复兴运动与经世致用思想潮流的下游，不过如果考虑到作为一种实际信仰而非纯粹学术主张的儒家思想在传统士绅心中的分量，那么这一思想运动对于“梁启超们”意义同样重大，尤其经世致用观念几乎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信仰之大端。此仍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内部演义。

西方思想的引入带给晚清思想界的冲击和变革显然更为剧烈。严复《天演论》以那种投合于旧士大夫文人阶层的辞藻把完全属新的西方进化论介绍到中国，“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观念对于中国之情势太有针对性，对于热切企盼富强独立的国人太具说服力，因而迅速传播和普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成为最无可置疑的世界观核心。同时围绕这种世界观，集体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力本论等思潮一齐涌入中国^②。这些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相遇，经由晚清人选择、融合、拼凑或削凿，遂构成一错综复杂、脉络紊乱的晚清思想体系。实事求是地讲，晚清并无在历史上可称一流之思想与思想家者，但晚清主张之庞杂喧嚣及其意义之典型却十分难得，也许唯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与之相匹敌。其间魅力皆在于它赶上了一个两极相逢的时代，即所谓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相逢的时代。晚清思想之

① [美]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② 当然如果更细致地看，中国人那时对进化论的接受是一件更复杂和多意的事。以章炳麟为例，他后来便从大乘佛教先验论所固有的虚无逻辑出发否定进化观，并且指出：“中国人正被他们因不断被外国战败和强者自然支配弱者的进化论信念塑造的沮丧心理所束缚。”（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周作人也从更人道的立场来纠正进化论的偏颇，他说：“吾闻之，人生以苦乐为究竟，否此者皆属涂附之辞。故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见者也。”（周作人《〈孤儿记〉序》）与此类似，晚清其他西方思想主张在中国的接受状况也都充满了诸种复杂的争议。

得失功过我们这里不予评论，但是它带给文学尤其 20 世纪初文学的影响显然不容回避，因为牵引文学向前迈进的正是这些思想统辖之下的人群。即以小说而言，它在晚清所赢得的地位便与经世致用的观念牢不可分，而功利倾向自始至终都伴随了晚清小说的发展历程。不过事实最后告诉我们，这些过于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或者说他们那种直白好斗的理性主义并不适合于真正文学品质的形成和提升。产生不了经典反而庸作迭出的时代毕竟是可怜的，在后世评判中它将很难使人心悦诚服。

晚清又是一个文化生态与商业市场都发生显著变迁的时代。就文化生态来说，晚清向着更为世俗与通俗的方向发展。这与当时启蒙越来越成为迫切之现实任务密不可分。由于启蒙需要晚清人对于民众知识的普及开始产生充分的自觉意识，国语运动以及通俗文学的兴起即是这种自觉意识的结果。历史学家王尔敏曾有著述《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专论近代文化生态之变迁，此不多述。而晚清的商业市场也向着颇具现代特征的方向转变了。尤其是在那些最先经受西方因素冲击的口岸城市，比如上海，现代市场逐步成形。以我们要涉及的文化领域而论，新型书业实体连同它背后的经营法则和技术支持，同时还有城市职业文人与市民受众一起，组成一个初具现代性质与规模的市场体系。新的竞争便在这个体系下拉开帷幕。

作为“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中国知识群体在此时的转型更是晚清过渡的重要表征之一^①。知识群体的转型概括地说就是指他们从传统意义上的士绅或士人向现代新型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因而也有人将这一时代的知识群体称为“士-知识分子”，其意即在表明他们身上过渡的特性。“士-知识分子”就其社会位置来说属于“中等社会”的行列。陈旭麓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论近代“中等社会”诸种社会构造成分，他讲道：“‘自居于士类者’的另一部分，也是

^① 杨国强在他的论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序言中讲道：“而七十年中立起于陌生和窘迫之间，自觉代表中国社会回应西潮逼来的，则始终是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士大夫。在当日统称‘四民’的口中，他们是忧时的人，也是先觉的人，随后，在回应西潮逼来的漫长过程里，他们又成了最深地卷入了历史变迁的中国人。”

最重要的部分是 19 世纪末开始的各种新式学堂所培养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包括为数不少的留学生，以及从传统经生、儒士脱颖而来的知识分子。”^① 可见这其实是一个品类与来源都颇为繁杂的群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晚清这个社会结构与分层发生急剧变化，并且进行着新的重组与调适的历史阶段，“士-知识分子”同中等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表现出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它充分展示了新旧两种因素和势力的相互交织与矛盾冲突。这一群体无论是在人生轨迹、身份认同，还是在知识结构、文化心理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当明晰的过渡特征与双重内涵。

首先，就其人生轨迹与身份认同来说，这一批人一般都经历了从士人举子到新学堂学生的角色转换。尤其 1906 年科举废除之后转换的倾向更趋明显，因为现实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定位自我，同时也寻找与外界新的关联。如果说古代士人阶层，无论出仕与未得出仕者，其实都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统治秩序与传统的某种内在共存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利害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那么晚清此时的知识群体显然已经逐步脱离这一轨道，他们不再以庙堂为唯一立命之地，而于个体精神而言也向着真正具备独立人格、批判意识、反思能力与自由意志的新型知识分子靠拢。不过，他们依然是那种一脚踏入了新的行列，而另一脚还站在士大夫历史末端的人，又或者，有一些传统是延续下来了，比如那种民胞物与的担当精神和淑世情怀，比如对于政治的由衷看重和执着。这二者在后世相当长一个时间范围内几乎规定了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终极意义既不似古希腊智者的面向外部客观世界，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知而求知；也不同于印度佛教徒的专注个人内心修炼，断绝红尘超凡脱俗，达到精神的‘涅槃’境界；他们的人生关怀无论通过什么样的中介，最后总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落实到意识形态的塑造，这是他们真正的终极性关怀，治国平天下是他们个体人格的终极性意义”^②。这当然与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9 页。

② 许纪霖：《现代化变迁中的价值探寻》，见《许纪霖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63 页。

中国这个国家在近世的坎坷命运颇为相关，但也肯定根源于自先秦而来的悠久的士大夫精神传统。

其次，就这个群体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心理来看，他们多半为由旧学而入新学者。西风东渐，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西方文明及其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在未来引领中国迎接世界新竞争的绝不可能再是传统所谓修身平天下的儒家经学之类。这一批人通过学堂、教会、报刊等渠道接触西方新知，他们即便没有做到体系性地掌握西学，但起码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自然、社会、人文诸学科门类，可以说西学的基本轮廓在他们头脑中已经形成。以孙宝瑄为例，从其《忘山庐日记》记载来看他的读书范围就遍及西方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科学诸领域。而那些到过西方的知识人，他们对于西学的理解更为深入，运用也更为自如。即以小说领域的事例来论，严复和夏曾佑 1897 年为《国闻报》所著那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其中关于所谓英雄、男女二类“公性情”的追溯就展示了作者堪称广博的西方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知识^①。然则西学乍新之时也正是旧学将颓之时，因此这一批知识人在文化心理上又不免是伤感而充满矛盾的。留日的湖北籍学生曾办过一份叫作《湖北学生界》的杂志（后来又改名《汉声》），这是一份充满激进革命热情的刊物。但在这份刊物的最后却不太协调地附录了一期名为《旧学》的增刊，扉页题词是这样的：“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鉴，振大汉之天声：仆等负笈西洋，于今十载，旧学荒芜，尝用自愧。忆昔鄂渚登舟，晴川把袂，二三知己，竞赠琅函，殷殷嘱以游学远方，勿忘祖国。投书数卷，用当别言。就学以来，每于课暇，检点旧籍，如对故人。蚊脚蟹行，新识粗增，蠹简韦编，故癖不改。表古今之思想，合中西而贯之。念华夷界限，必代春秋呼冤。展腥膻历史，誓为种族流血。兹承东学诸君，招我以书，嘱撰丛报。匆匆税驾，不克抽思。爰取鄂友旧赐之卷，合以家塾上口之书，口述手抄，略得一卷。仿梁昭明之例，编次成书。微言大义，谁能更赞一辞。报

^① 天津《国闻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至十一月，几道（严复）、别士（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